

葛剑雄
丁 东
向继东 主编

当/代/学/人/自/述

望
尽

天涯路

望

天涯路

当/代/学/人/自/述

葛剑雄 丁东 向继东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望尽天涯路:当代学人自述/葛剑雄,丁东,向继东主编.

--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391-8218-6

I. ①望… II. ①葛… ②丁… ③向… III. ①随笔—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4862 号

望尽天涯路——当代学人自述 葛剑雄 丁东 向继东 / 主编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刘华彬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66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8218-6

定 价 35.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2—77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总 序

《当代学人自述》是一套不定期连续出版的丛书。

所谓当代学人，主要是指进入 21 世纪以后仍然活跃在学术领域的学者，其生年上迄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下至 60 年代，因近二三十年为其学术的高潮期。本书展示的学人在专业上以人文和社会科学为主，兼顾某些文理交叉的学科；地域上以中国大陆的学人为主，兼顾海外华人学者。选择这种定位，意在向关心当代中国思想文化走势的读者呈现当今学界群像，并为今后的学术史积累研究资料。

学者自述，固然可以讲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成果，但我们更看重求学、治学中的人生体验和心路历程。我们希望学者的自述文字，能够超越学科分工的阻隔，呈现普遍的意义。所以力求文风清通畅达，言之有物，不止面对专业同行和学界同仁，同时面对社会公众。

求学需要师承，机遇需要把握，逆境使人发奋，追求永无止境。每位学人，各有精彩。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社会历史的大转型，学界自然也处在激荡的巨变之中。这一时代的学人，从校门直接走向平静的书斋并不多，而是更多地经历了政治风雨的洗礼，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碰撞，生命的历程由此而跌宕起伏，荡气回肠。

这一时代的中国大陆学人，赶上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告别个人崇拜和人格依附的思想解放大潮，有了重建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机遇，往往更具有反思的精神气质。这一点尤为编者所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希望成为当代中国知识界精神追求的一个缩影。

本书汇萃的学人自述，篇幅不一，短则数千字，长则数万言。不求全面总结，完整回顾，只取思想的截面，精华的展示。这些文字，可以成为走近这些学人的一个向导。如果产生兴趣，还可以由此寻找他们更多的人生或学术轨迹。

编 者

2012年7月

目 录

总 序

何 方	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	001
朱 正	从鲁迅研究开始·····	011
袁伟时	书生报国的心路历程·····	034
邵燕祥	我与诗与政治——诗与政治关系的一段个案·····	070
钱理群	我的精神历程——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	092
杨继绳	父亲的命运与我的思考·····	131
李醒民	泛舟学海任西东·····	143
智效民	我这三十年——从考研到退休·····	156
萧功秦	在精神自由中反思——回顾我的学术之路·····	174
杨小凯	我的一生·····	189
陈为人	追求生命的真实·····	210
杨奎松	研究历史，需要悟性和想象力·····	226
秦 晖	求索于主义与问题之间·····	239
高 华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268
雷 颐	精神年轮——从知青到历史学者·····	284
吴 思	底层体验与问学之路·····	298



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

何方

1922年10月出生，陕西临潼人。1938年赴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1945年毕业于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抗战胜利后去东北，先后任县委宣传部长、省青委副书记等职。1950年随张闻天进外交部，先后任驻苏使馆研究室主任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9年受到错误处理，1978年平反。先任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8年，后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7年。1998年底离休。学术专长为国际问题，中共党史。主要著作有《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何方集》、《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何方谈史忆人》等。

一 我的经历

我原名李彦贤，1938年参加革命时改名何方，一直用到现在。

1922年年10月18日，我出生在陕西省临潼县（现改为西安市一个区）一个农民家庭。父母均为目不识丁的农民。我从小就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业生产劳动。1931年进私塾上学，两年后转县城小学，1937年考入西安第二中学，并参加一些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夏经人介绍，进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的安吴青训班受训，一个月后即伙同几个同学步行去延安，准备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天下午走到泾阳，就被当地国民党当局扣押，后又送西安三青团继续关押。经过近一个月的斗争，已看出恢复自由无望，几个人遂商定夜间翻墙逃出。后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安排，第二次赴延安进抗大。

1939年抗大总校开赴敌后，我被编在留驻延安的第三分校。1940年毕业后留校任政治助教。1941年调俄文队学俄文，并参加整风和生产劳动。1942年发动的延安整风，上层是搞所谓路线斗争，实际上就是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下层主要是审查干部、清理阶级队伍，大部分时间是搞抢救运动（抓特务）。毛泽东在延安搞的抢救运动（后来都把责任推到了康生头上）和“文化大革命”中搞的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样，完全是一种无中生有的瞎折腾。当时各机关学校三万脱产人员有半数被打成特务，最后发现全是错案，一个特务也没有，抗日战争胜利后，全部分配工作。当时抓特务，不是靠调查研究取得真凭实据，而是靠互相咬和组织上的怀疑认定。所以我虽然15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但也被咬成了特务，随即遭到昼夜抢救。被整了两三年，最后宣布弄错了，还编造了个原因，说是由于个人思想意识有问题。我理所当然地拒绝在这种结论上签字，并提出申诉，认为组织上应承担弄错的责任。日本投降后不到半月，即被派赴东北工作。

1945年9月2日离开延安，经过约两个月行军到沈阳。因偶然遇到张闻天夫妇，随即跟他们一起去北满。北满分局分配我到黑龙江省双城县做地方工作。先后任双城学院主任，县委委员兼区委书记，从事发动群众和剿匪的

工作。1947年奉东北局命，带领工作队南下，先后到吉林东丰县和辽宁辽阳县搞土改和对敌斗争。1949年5月任辽南省青年代表团团长，赴北平出席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会后被分配到辽东省，任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遇上时任省委书记的张闻天，从此被他用作助手跟他工作了十年。1950年随张闻天调外交部驻联合国代表团在北京待命。1951年随张闻天去驻苏联使馆，任研究室主任4年。其间写了十多篇调研报告，包括《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评英国的所谓亚洲洛迦诺计划》、反映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若干篇报告等。1945年被临时调去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从事起草发言稿等文字工作。1955年调回外交部，先后任研究室专员和办公厅副主任，协助张闻天主管部属各单位和驻外使馆的研究工作、草拟以外交部名义发的文件和撰写调研报告。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受到撤销办公厅副主任职务、降为专员，行政级别由11降为13级，党内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从此挨整二十余年，一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

1959年底外交部反右倾运动一结束，我就被下放到饥荒重灾区安徽六安农村劳动改造，几乎饿死。1960年底回北京住院医治因饥饿而得的浮肿病，病情稍轻后被任命为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主管研究工作）组长。

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三年困难的严重后果，导致全国大饥荒和饿死三四千万人。这在国内外无法交待，毛泽东和刘少奇虽不愿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但也不得不对大跃进以来被整错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由于庐山会议上问题不可能得以解决，所以外交部对甄别平反问题也不认真对待。直到1962年，全国已为六百多万整错的干部平了反，外交部才不得不对我等挨整的干部进行甄别，但仍然要实行“瓜蔓抄”，总要同张闻天联系起来，只是把参加张闻天反党集团下调为与张闻天有宗派关系，把右倾机会主义改为严重右倾。相应地，处分也稍为减轻，把留党察看一年改为党内严重警告，从行政13级恢复到11级。但在使用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而且部党委有些人对我仍不放松。说我系政治问题，不宜接触外交机密，不可留在部内。在

他们的坚持下，1963年部党委决定调我去国际关系研究所。一位忘年交、时任国务院外办副主任的李一氓，得知此事后就认为我搞外交已无前途，因此建议我离开外交部去地方工作。我也就随之提出了调动工作的意见。部党委爽快答应为我联系地方，在工作未定前先被派去参加农村四清，加入在河北昌黎县的外交部四清工作团。参加了两期四清，用时一年多，部党委也给我联系好了地方工作，即就地安插，任河北省昌黎果树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我虽知自己完全不适应，但来地方既是自己的要求，也就不便再说什么。可这时外交部却变了卦，从河北省把我调了回来。因他们主管的《世界知识》总编辑得了癌症，临时找不到适当人选，就找我顶替。我只好重回外交部。但还没报到，即逢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火燎原。外交部也让我别急着上班，先回办公厅参加运动。从此，我就脱产参加“文化大革命”，先后十余年。

运动一开始，部党委为了替自己解围，先照例抛出一批人作为交群众批斗的牛鬼蛇神。我就在第一批被抛出的35人之内。随即由群众专政、批斗和从事体力劳动。在北京挨整3年，于1969年3月下放外交部江西五七干校长期改造，前后挨整和劳动9年。在此期间，外交部党委指示还对我作了如下处理：开除党籍，从行政11级降为14级（先通知降为13级，已向下传达，后因考虑到当时13级仍可享受高干待遇，遂临时通知再降一级）。

林彪出走后，“文化大革命”和干校管理都已大为放松，我已可有计划地进行理论和文化学习，还搜集材料研究点问题，同时不断向部党委以至中央监委提出申诉，要求审查我的问题，恢复我的党籍。虽然都是石沉大海，但我还是坚持到了最后，直到外交部答应复查为止。

我在干校呆了整整9年，直到1978年，外交部领导仍不让我回部工作。这时中央大多数机关的干校已卷帘大散，外交部干校人员也大部分自行回京。我看呆下去实在没意思，而且争取恢复党籍也必须回到外交部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因为我以前写了那么多的信和申诉书，都一直没有人理。决心一下，我就自动离开干校回到北京，而且任凭怎么动员也不再回干校了。

经过1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也总结出了一些人生教训。我参加革

命后，就已下定决心，把自己一切献给党，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所以此后多次挨整，都是逆来顺受，从不计较。但是这革命怎么还是老往自个儿头上革，特别是在延安整风中被打成特务，1959年硬要定为追随张闻天反党，而且一整就是20多年，这使我感到十分困惑。后来得出结论，不能再逆来顺受，应当学会斗争哲学，遇到不合理的事就坚决斗争。结果还真灵。经过近一年的斗争，把外交部从1959年起20多年历次强加在我头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和各种错误的处分统统推倒了。部党组在1979年2月28日给我做的《审改决定》中不得不承认，1959年以来对我的定性和处分“是不对的，应予纠正平反”。这就等于搬掉了长期压在我头上的一块大石头。与此同时，我也希望离开外交部这个整了我二十年的不愉快工作单位。可是，这时的外交部，特别是部长黄华，却坚决不放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邓力群就给我出点子说，那你就别给它上班。我也真的照办。经过半年斗争，终于离开外交部，调到了社会科学院，从此就专门从事研究工作，1999年离休。随后改行研究中共党史，直到现在。

二 我的研究工作

我虽然做了大半辈子研究工作，但很难说成是学术研究。不过里面也确有学术研究的成分，只是不大容易分出来论述。所以这里就笼统地谈一下我的研究工作。

我的研究工作，从人生历程讲，可以分为两大段。一段是建国后调到外交部的10年，即从1950年到1959年，曾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1951—1955年），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5—1959年）。1959年因受张闻天的牵连，遭到错误处理，有20余年没有工作，除接受批判斗争外，多为下放农村和劳动改造。另一段是1979年8月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到离休，先后任日本研究所所长和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在外交部10年的研究，写的调研报告不少，但照例不留底稿，也已记不清题目和内容，只知道都是为当时的外交斗争服务的。现在只举几个还多少记得点内容、并对外交工作起

到过一定作用的两篇调研报告为例。

一是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1951年5月正当朝鲜战争处于胶着状态之际，我在张闻天指导下写出一份关于朝鲜停战和谈问题的内部研究报告，报送外交部和党中央，得到中央和外交部的高度重视，曾复电表扬。周恩来总理还特别提出，以后此类报告应以电报发回，不必等信使带，以免延误时间。报告虽然没正面提，但实际上是从否定朝鲜战争出发。因为朝鲜战争是执行推进世界革命路线导致的结果，原因出于对时代判断的错误。就是当时决策者——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都认为，二战后世界仍然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打南朝鲜、发动朝鲜战争，就是推进世界革命的一个步骤。所以当战争已僵持在三八线、把美国赶出南朝鲜的可能也实属渺茫的情况下，毛泽东和斯大林还力主打下去，不惜牺牲更多的人命和毁坏更多的财富。后因斯大林死后苏联新的领导集团不愿意再打，金日成更不想把朝鲜变成焦土，都力主和谈停战。执行“一边倒”政策的毛泽东没办法了，只好同意。我们的报告正是在这个节骨眼儿送上的，所以就得到了主张和谈的周恩来总理的表扬，对主战派也多少形成一定压力。一个驻外使馆研究室的调研报告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由于时任大使的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更重要的还是驻苏使馆的报告反映了苏联的观点。

二是关于印度支那的划界而治。1954年日内瓦会议，先讨论朝鲜问题，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后谈印度支那问题，反而实现了停战和划界而治。当时的印度支那战争，法国已实在打得精疲力竭、难以为继了，英国也不愿意法国长期陷入印支泥潭，所以时任英国外相的艾登就提出了东方洛迦诺的建议。而我方（中、苏、越）当时还没有什么具体主张，只是想奠边府战役能取得更多一点胜利果实，然后继续打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篇《评英国的所谓亚洲洛迦诺计划》的调研报告，分析英法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底线，无非是停止战争、划界而治、然后维持现状。标明洛迦诺，只是援引1923年欧洲主要国家在意大利洛迦诺签订的维持当时欧洲现状的协议。协议的主要作用在于求得和苏联和平共处，使欧洲脱离战火威胁，赢得一个和平稳定局面。我的报告起到了两个作用，即摸清西方（主要是英法）的底牌和说明我

方取得胜利的限度，而这两条正是中央亟需了解的。所以当张闻天将我的报告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送交周恩来时，当即得到他的高度赞赏。事实上，后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第二阶段日内瓦会议，大体上也就是按此预测进行的，用的时间较快，取得的结果也是在整個印度支那停战：越南分界而治，柬埔寨和老挝实行中立；实际上是法国势力退出印度支那，美国势力进来，中国的援越抗法变成了更长期的援越抗美。

另外，在驻苏使馆期间，我还有一两年投身于追踪和调查研究苏联的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我组织使馆研究室同志和自己所写的调研报告，曾在国内引起一阵轰动。那时正是中国执行“一边倒”政策的时代，苏联的动向对中国至关重要。1953年斯大林死后，新的苏共中央领导掀起一阵强劲的反个人崇拜宣传，先没有指名，后直指斯大林。使馆当然要将这一重要情况及时了解清楚并报告国内。因此研究室就在张闻天大使的指导下，集中力量调查研究了苏联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写的有关报告有十几篇，在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毛泽东、刘少奇就分别向全国批发了好几篇，中宣部的《宣教动态》摘要转载了十数篇。这就使反个人崇拜问题在中国的宣传教育中普及开来，使正在上升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高潮被抑制了几年。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成为1959年批判张闻天（也包括对我这种小干部的批判处理）的一条“罪行”，说在中国反个人崇拜就是反毛。。

1955年我从驻苏使馆调回外交部，虽然增加了许多行政事务，但研究工作仍是我的一项主要任务。不但自己搞研究，还协助张闻天主管部内各单位和驻外使领馆的研究工作。这些当然都是国际问题的研究。1959年后我的研究工作中断了20年。1979年起，又恢复这方面的研究，经过十余年直到离休后才转入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我一生的学术活动就只限于这两方面。这里只简单谈一下个人研究工作的几个主要观点和思想认识。

一是卷入建国后两条外交路线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外交路线，从一开始就有两条。一条认为，世界仍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即战争与革命时代），战争不可避免，而战争又必然引起革命。所以我们要加强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

争。对内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革命”；对外以推进世界革命为目标，着力输出革命，口号就是“打倒帝修反”。这一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建国头三十年贯彻执行的也就是这条路线。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世界革命路线由于违背世界潮流，不合时代特征，所以处处碰壁，最后以彻底失败告终，并对新诞生的共和国带来巨大损失，造成对外闭关自守和长期孤立。在二战后世界经济科技的高速发展时期，置身于世界潮流之外，关起门来瞎折腾，不但丧失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且使社会全面倒退，国民经济与居民生活水平绝对下级，单是因人祸饿死的人就达四千多万。历史证明，这是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痛苦和损失的三十年。

另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张闻天，主张中国外交的总方针应是和平共处。张闻天认为，当时不存在世界革命形势，认为战争有可能避免，世界将面临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也不存在世界革命形势，因此中国只能也应该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搞好国内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外就是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长期和平共处，坚持革命不能输出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不可去搞什么世界革命。那样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反而会给革命力量带来损失。作为他的主要助手和文稿起草者，我当然和他的思想完全一致，也就是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1956年6月张闻天让我写了一篇《论和平共处》（收入《张闻天文集》四），一字未改就交付打印。原来他想以此作为他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但由于毛泽东对他实行打压政策，根本就不让他发言。当他领我（以便听取意见后由我作进一步修改）一起向周恩来送去发言稿（《论和平共处》）时，周恩来大概早已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所以连看也没看就说，关于外交问题，已有陈老总（陈毅，这时为副总理，尚未任命兼外交部长）一个发言，你就不用再讲了。张闻天自然无话可说。我当时就感到，这是对他有计划地打压。一次党代表大会，有那么多人发言，一个身为政治局委员的人竟不能做一个和别人不同内容的发言，这说明党内也是专制独裁，毫无民主。

两条路线的另一重大分歧是对二战后兴起的民族民主运动高潮的态度。毛泽东认为，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因此所有的亚非拉国家都

应进行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对它们应加以引导，施加影响。张闻天则认为，二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独立后建立的也是资产阶级统治，走的自然是资本主义道路，并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他明确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前景的估计，已被二战后的事实证明是不准确的，毛本人后来做了修正，也没抓住要害，只涉及一部分民族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问题，而没有改变他关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基本观点（他1958年9月2日对巴西记者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二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要跟帝国主义要跟社会主义走，没有第三种情况，这种观点事实上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印度等许多国家不站在帝国主义或社会主义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1957年，我随张闻天视察我国驻印度、印尼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大使馆，历时半年多，也对这些战后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进行了就地考察，由我执笔先后向中央写了好几份调查研究报告。我个人经过几年的研究，还写了一篇有关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主义国家成长的公开论文，发表在1959年第三期《国际问题研究》上。

二是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时代问题。1985年邓小平提出世界存在两大问题，就是和平与发展。1986年我把这两大问题定性为两大时代特征，并同列宁的战争与革命并列起来，说成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我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只是个过时不过时的问题，而是许多论断当时就不准确。历史已经证明，他对资本主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想当然，实际上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生命力，正在蓬勃发展，还会继续发展下去。我的意见，当时曾引起理论界的轩然大波，受到一时的围攻，连陈云也参加了批评（见《陈云文选》第三卷第370页）。但是人们终究还是讲道理的，所以经过近十年的争辩，最后全国理论界绝大多数已认同和平与发展时代。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我第一个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已完全站住，几乎没有人再提列宁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即战争与革命时代了。展望未来，根据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判断，和平

与发展时代还将持续下去。而且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人类之间也只能是和平的竞赛与斗争，并加强互助合作，共同促进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新的世界大战是不会再有的了。我也相信，以后再不会有理论界和领导层起来围攻和平与发展时代了。

三是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厘清了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这段历史的真实，纠正了延安整风期间制造的两个不实之词，但至今还在以讹传讹。一个是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实际上只是确定他做中革军委书记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至于全党领导，那就更谈不上。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集体领导。这一体制延续了3年，直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才成为实际上的领袖，名义上则直到1943年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另一个是说，延安整风是整教条主义的根源共产国际和苏联斯大林的风。这也是事后诸葛亮的编撰。实际上，毛泽东是利用苏德战争，苏联及其掌控下的共产国际无暇他顾之际，用发动整风算历史账的方式，批倒以前的领导人，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和对个人的崇拜，其次是严整抗日战争初期前后参加革命的大批知识分子（整个一代所谓“三八式”），使之成为驯服工具。而且也确实都达到了目的。

当然，我的研究工作并不限于此，这里只是顺便举几个例子而已。到本世纪之初，我的中共党史研究形成了两部著作，各分上下两册：《党史笔记》和《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此后即改为研究共和国成立后头三十年的外交，已经写出一章《绪论》：《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国际形势》。因为摔了一跤，造成脑震荡而中断了三个月，最近才又提起笔来，只是年届九十，进度很慢就是了。

我的学术自传就写到此为止。



从鲁迅研究开始

朱 正

1931年11月生于长沙。1949年9月在新湖南报社担任编辑。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列为斗争对象，被审查一年。1956年出版《鲁迅传略》。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1962年解除劳动教养后以体力劳动维持生计，劳动之余写有《鲁迅回忆录正误》、《鲁迅手稿管窥》两书。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又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劳改3年。1979年平反，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1993年写成一本研究反右派斗争的专著，1998年以《1957年的夏季》的书名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以《两家争鸣》的书名在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后修订于2004年在香港明报出版社以《反右派斗争始末》的书名分上下册出版。另有著作《鲁迅传》、《鲁迅三兄弟》、《报人浦熙修》、《重读鲁迅》（与邵燕祥合著）、《从苏联到俄罗斯》（与蓝英年合著）及《辫子、小脚及其它》等几本杂文集。